

超前与等待： 从时间角度论现象学与现代技术科学是否有“竞争关系”

Hasting versus Waiting: The Question of “Compet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Phenomenology and
Modern Technoscience from a Temporal Perspective

刘任翔 / LIU Renxiang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 湖北武汉, 430072)
(School of Philosoph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2)

摘要: 现象学批评现代技术科学将事物等同于对事物的概念规定, 转而强调直观。但现象学直观是否是一种与技术科学的概念规定相独立且竞争的通达事物的方式? 本文从时间现象学的角度回应这一问题。文章分析了康德框架中直观和概念规定各自蕴含的时间性, 解读了海德格尔在《物的追问》中提出的“数学特性”对事物的“跳过”, 从而阐明“先行把握”的概念及其预设的事物的同质化。在此基础上, 本文提出一种有关事物展开的内在节律的存在论模型, 表明时间的原初意义是事物之堂奥渐次展开的“创生性的阻力”。从而, 现象学的“直观”并非在概念规定之外的另辟蹊径, 而是对概念规定之“超前”倾向的补正——换言之, 是在培养我们“等待”事物内在的时间节律的能力。

关键词: 现代技术科学 现象学 概念规定 数学特性 内在时间节律

Abstract: Phenomenology criticizes modern technoscience's identification of things with the conceptual determination thereof and emphasizes intuition instead. But is phenomenological intuition an access to things independent from, and competitive against, technoscience's conceptual determination? This paper addressed this ques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henomenology of time. The author analyzed the temporalities implied respectively in intuition and conceptual determination in the Kantian framework, and interpreted Heidegger's notion of “das Mathematische” in *Die Frage Nach Dem Ding*, explaining how it enables us to “leap” over things, thus clarifying the work of “grasping in advance” and the homogenization it presupposes. Next, based on this, the author proposed an ontological model of the intrinsic rhythm of the thing's unfolding and argued that the primordial meaning of time is the “productive resistance” at work in the piecemeal manifestation of the thing's intricacies. Thus, phenomenological “intuition” is not an access to the things apart from conceptual determination but a remedy for the latter's tendency to “take the lead”—in other words, the point is to nurture our ability to “wait” for the intrinsic temporal rhythm of things.

Key Words: Modern technoscience; Phenomenology; Conceptual determination; Mathematische; Intrinsic temporal rhythm

中图分类号: B516.52; N09 DOI: 10.15994/j.1000-0763.2026.04.014 CSTR: 32281.14.jdn.2026.04.014

基金项目: 博士后科学基金第73批面上资助“现象学存在论视野下时间与意义之关系的研究”(项目编号: 2023M732010)。

收稿日期: 2022年7月27日; 返修日期: 2025年11月19日

作者简介: 刘任翔(1991-)男, 江苏南京人,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现象学、德国古典哲学、当代法国哲学。Email: renxiang.liu@whu.edu.cn

一、现象学：技术科学的竞争者？

对现代技术科学(technoscience)的反思并非现象学的一种边缘性“应用”，而是现象学在兴起和发展过程中的核心动机之一。“回到事情本身”(zu den Sachen selbst)的呼吁，来自对技术科学主导下用符号表征“覆盖”事物自身的做法的不满。胡塞尔在《欧洲科学危机与先验现象学》中点明了意义的“沉淀”(Sedimentierung)问题；^[1]而在哲学生涯的更早时候，他已开始追问这一问题，现象学的种种努力可以视为对沉淀了的意义的重新激活。

于是，现象学从诞生之初就处于对技术科学的一种批判态度之中，但批判从来都不等于单纯的否定。现象学承认技术科学在某一范围之内有效性、有用性和精确性，但认为它不能概括世界的总体，尤其不能解释自身的意义来源。胡塞尔对科学之“前见”的“悬搁”^[2]、海德格尔对现成在手(vorhandene)事物的存在者层面(ontische)描述的存在论奠基^[3]、梅洛-庞蒂对自然科学的“实在”之下的前科学的“不可追忆者”(l'immémorial)的探询，^[4]、^[5]都是为了揭示技术科学所展现乃至“订制”(bestellen)^[6]的世界的不完备性。有趣的是，对不完备性的揭示时常借助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对直观(Anschauung)和概念规定(begriffliche Bestimmung)的区分。一方面，现象学认为技术科学完全在概念规定的层面内运作，并将对某物的概念规定等同于该物本身——例如，说水“不外是”由H₂O分子组成的物质。另一方面，现象学希望通往一种对事物的非概念的直观；它希望达到的是“纯粹的现象”(the pure phenomenal)、前反思的存在(pre-reflective being)等等。

尽管现象学未必是要用对事物的直观完全替代技术科学对它的概念规定，它对概念规定的完备性的论述仍然招致了持自然主义的科学家和哲学家的质疑。这种质疑集中表现于如下诘问：通过揭示概念规定的完备性、并试图用直观来“补全”，现象学是否提出了一种

既与技术科学相竞争、又缺乏技术科学所具有的严格性的揭示事物的方式？现象学是否必定通往一种“玄学”？

本文希望通过分析事物在得以揭示的过程中所展现的时间结构来回应这一诘问，从而从时间性的角度重新界定现象学运思的基本方式。首先，本文在康德的框架中分析“直观”和“概念规定”各自蕴含的时间性，表明后者通过对事物进行一种排除了时间的规定，而寻求在实际遭遇事物之先便把握事物。接着，本文借助海德格尔在《物的追问：康德关于先验原理的学说》中对现代技术科学根底处的“数学特性”(das Mathematische)的分析，论证“先行把握”预设了事物的同质化。尔后，本文提出一种有关事物展开的内在节律的存在论模型，表明时间的原初意义是事物之堂奥渐次展开的“创生性的阻力”(productive resistance)，而基于“数学特性”的概念规定则是要抢在事物实际展开之先便知晓乃至操纵它的展开方式。最后本文提出：现象学所要求的“直观”，并非在概念规定之外的一种通达事物的方式，而是对概念规定之“超前”倾向的补正——换言之，是在培养我们“等待”事物内在的时间节律的能力。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中并不严格区分现代科学与现代技术。这种做法的预设是：现代科学的“知”从来都不仅仅是为了“知”自身，而是为了对自然乃至人自身的技术操控；而现代技术的实践又总是建立在科学对自然的理解和建构方式之上。两者的共同根源是对本文第三节所提到的“数学因素”的倚重。

二、直观与概念二分的时间维度

现象学产生于新康德主义的背景下，它的基本态度是：接受康德通过区分直观与概念规定而对莱布尼茨-沃尔夫的理性主义的突破，同时反对新康德主义以概念规定吞并直观的倾向。胡塞尔的“范畴直观”概念意味着，通常被认为是概念思维的领域之内的对范畴的运用，事实上也根植于一种直观活动。^[7]海德格

尔在对康德的解释中更是指出,直观是一切知识的起点和终点,而概念规定,即通过普遍概念而对个体事物达成的曲行性(diskursive)的规定,则仅仅是因为人这样的有限存在者没有上帝所拥有的那种在直观个体事物的同时创造它的本原直观(intuitus originarius),而仅有不创造个体事物、只是被其“打动”(affiziert)的派生性直观(intuitus derivatus)。^{[8],[9]}由于“打动”我们的不是整个的事物,而往往是事物的有限的方面,我们才不得不走概念规定这条“弯路”,以便将事物的无限神秘减省为有限的范畴。结果,在人的知识能力的运作中,就总是不得不同时涉及直观和概念两者:直观如同一个瘸腿的人,而概念是其拐杖。

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直观和概念规定在康德的框架中所蕴含的时间维度。康德明确说时间是“内感官的形式”;事物的显象(Erscheinung)是作为诸表象(Vorstellungen)而在时间中通过感性被给予的。另一方面,概念规定依托的是先验统觉(die transzendente Apperzeption)即判断着的“我思”,而这个“我思”虽能够伴随一切在时间中被给予的表象,其自身却是无时间或在时间“之外”(äußerzeitlich)的,正因为此才能作为同一的“我思”去综合杂多的表象而形成判断。不仅如此,判断所依据的范畴和原理也是无时间的形式,不似作为质料的诸表象那样在时间之内。总之,对某事物的概念规定,尽管实际上必须在时间之内形成(因为构成了该规定的诸表象必须在时间之中被给予),概念规定的内容却是无时间的——换言之,是“不以时间为转移”的。

这个看似抽象的描述,却十分符合现代技术科学运作的基本方式。在面对事物的显象时,技术科学首先需要形成一些基本概念,如物质(由基本粒子构成的、有质量的自然存在)、运动(物体位置依时间的变化)、乃至时间(以钟表的周期运动所度量的事物“历经”事件的尺度)。进而,它会定义一些具体概念,如植物、细胞、分子、原子等。比这更具体的概念(如兰花、红细胞、水分子、氢原子)总是从上一级概念中通过附加更多的规定而得出的。而一

旦如此得出的概念网络能够“覆盖”向我们显现的种种事物,现代技术科学就能够通过在概念层面演算推理的方式来知晓有关事物自身的事情。在这里涉及的预设是:事物就等于对事物的概念规定。从而,当我们基于现代科学的范式研究水稻、或以现代技术的范式操纵水稻时,就无需去关注每一株个体的水稻的情形。只要它们都是水稻,它们就都应符合对水稻的普遍的概念规定。换言之,概念规定使我们得以在遭遇具体的水稻个体之前就“定下”它必须符合的条件。

这个“之前”,对于现代科学和技术而言至关重要。能够在实验室里被研究的事物个体始终是极少数,但研究的结论却适用于一切符合概念规定的条件的可能个体,即便人们在实验室内外都尚未遭遇后者。类似地,现代技术的力量在于能够以理念的设计“先行于”现实世界,操纵或迫使现实世界中显现的事物符合在设计中预先勾勒好的形式规范。当人们以现代工程的方式设计建造一座桥时,桥的使用年限(如100年)是这种预先勾勒的一部分,从而,尽管设计师和施工者不用、乃至不可能活到设计年限到来之际,他们仍然可以借助概念的规定和演算而预先保证造出的桥在年限到来之前都不会发生坍塌的事件。

我们对现代技术科学中概念的规定是如此习以为常,以至于常常将事物的“被知”等同于被概念规定,甚至将不能被概念规定的事物斥为根本不存在。康德本人也承认,直观和概念中的任何一者都无法独立导向知识,而知的活动只有从直观(统握,Apprehension)“上升”到概念的规定,才算是导向了真正的知识(判断)。换言之,只有从在时间之“流”中被给予的表象中辨认某些不随时间转移的规律(如下雨和地湿之间的因果关联),我们才算是真正地知晓了事物。在这个意义上,康德本人也是根据现代技术科学的范式来定义事物向我们的敞开方式的。

但与此同时,康德并不必定认为种种概念规定穷尽了事物的存在样态。与莱布尼茨-沃尔夫派不同,康德并不认为感性直观只是通过

概念的理知的“低级”形态;而感性直观是“被给予”(gegeben)的观点、乃至对物自身的颇成争议的设定,都可以看作是要强调事物相对于我们对之所作的概念规定的“溢出”(excess)。但是,这就意味着:在时间中给出自身的事物,至少对人而言是不可能通过无时间的概念规定来穷尽的。不存在那种一劳永逸的对事物的预先规定(pre-determination)。

现象学正是抓住了这一点而强调直观的不可还原性,但它似乎比康德更加激进。在现象学所定义的“直观”(它未必等同于康德意义上的直观)中前来照面的,并非只是在普遍概念之下的个别(particular)事物,而是各自独一无二、有着无限的内在丰富性的个体(singular)事物。^[10]直观容许了个体事物以其全部的独特性前来照面,而概念规定则相当于是为了理解、交流或操作的方便而减省了个体事物无限的丰富性,将之把握为类存在。

这就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仿佛现象学想要伸张的是一种与概念规定相互独立、并且优于概念规定的通达事物的方式。例如,海德格尔对梵高《农鞋》的解读,似乎指出了一种优于将鞋看作类存在或功能性存在的与鞋照面的方式。^[11]与此同时,在未采取现象学传统的基本立场的科学家或哲学家看来,这种对“另一条路径”的诉诸无异于某种神秘主义:在这里出现的直观,不仅缺乏技术科学的概念规定所具有的那种精确性、共识性,而且似乎限于一部分具有突出的领悟和视见能力的人,从而有导向精英主义的危险。

三、“数学特性”与对事物的先行勾勒

然而,事情果真如此吗?现象学(phenomenology)是否必定要对现象(phenomenon)给出一种异于且优于技术科学之概念规定的言说(logos)?

本节分析海德格尔《物的追问》中有关“数学特性”的论述,追问技术科学的概念思维方式的局限。对这种局限的理解有助于我们反过来理解现象学对自身的任务的设定。

海德格尔明确区分了“数学特性”(das Mathematische)与作为学科化实践的数学(die Mathematik)。如果说后者指的是运用数字、变量符号、公式、几何图形等展开的测量、计算和推理活动,那么前者就是这种活动的存在论前提,是一种特定的“存在之领会”(Seinsverständnis)。正是依据数学特性对存在者所作的预先“勾勒”(Entwurf)使得存在者成为可以测量和计算的数学对象。换言之,数学特性是更根本的,而对数字等的运用仅仅是因为它们格外适用于按照数学特性勾勒事物。“数学本身只是数学特性的一种特定的形成方式。”([12], p.69)([13], p.62)

为了澄清数学特性所谓何事,海德格尔首先聚焦希腊思想中τὰ μαθήματα的概念。该概念属于对物的规定方式之一,与之并列的规定方式还有:τὰ φυσικά(就其自我发源和显现而言的物);τὰ ποιούμενα(就其被人的匠艺所“树立”而言的物);τὰ χρήματα(就其被使用并持续可用而言的物);τὰ πράγματα(就我们与之打“交道”而言的物)。([12], p.70)([13], p.63)

与上述规定方式有别,τὰ μαθήματα指的是物的如下特征:在真正遭遇它之前,我们已经对之有所把握,从而这种把握也是可学、可教的。为什么对τὰ μαθήματα的把握能够先于与它的遭遇?海德格尔说:“[τὰ μαθήματα意义上的]真正的学习……是获取者只获取到了一种他根本上已经拥有的东西的获取活动。……当他[学生]把所获取到的东西作为自己本来就已经拥有了的东西而经验的时候,他才算是在学习。”([12], p.73)([13], p.66)(强调为笔者所加)

当我们将事物看作τὰ μαθήματα时,从它那里“获取”的并非我们事先完全没有的东西,而是我们已经拥有的东西。我们已经拥有的是一套概念框架,它“并不是首先从诸物中提取出来的”;([12], p.74)([13], p.67)而我们在与事物打交道时,问的只是它如何“嵌入”这一框架;框架本身不接受来自事物的“刷新”。换言之,在遭遇事物之先,我们已经有了概念的框架,并且在事物之中看出的也仅仅是能够

填入该框架的内容。通过这种过滤和减省，我们才实现了对事物的预先的把握。事物的这种能够被预先把握的特性，就是所谓“数学特性”。

海德格尔接着考察了上述希腊意义上的数学特性在伽利略的“数学勾勒”(der mathematische Entwurf)中的体现。伽利略的“在心灵中设想”(mente concipere)所蕴含的对事物的规定，“不能以经验的方式从这个物本身中汲取。”([12], p.90)([13], p.81)被预先规定下来的毋宁说是“物体性”本身：一件物要作为物而存在，就必须有可量化的广延和运动等。([12], p.92)([13], p.83)这种以数学化的概念做出的对物的存在论规定，使得在该规定下前来照面的物已经是同质化的、可测算的：“所有对于物体的规定都有一个基本轮廓(Grundriß)，据此，自然过程无非就是对于质点的运动的空间-时间规定。这一关于自然的基本轮廓同时也界定了其处处均质(überall gleichmäßigen)的领域。”([12], p.92)([13], p.83)

由于在遭遇具体的事物之先便试图规定下事物的“轮廓”，这种规定必定是“均质”或同质化(homogenized)的。在此规定下前来照面的事物在质的方面同属一类，其相互的差异只能表现为量的差异。

那么，这样的预先规定为何出了问题？在现代技术科学沿袭伽利略而对自然进行的“数学勾勒”中，我们不是一直都在从量的角度考察事物吗？自然本身难道不是可量化的吗？自然之书不是以数学的语言写成的吗？以及——对本文的问题最重要的是——还有什么别的考察事物的角度，自然之书还有什么别的语言吗？

从海德格尔的文本中，我们找不到对这些问题的直接回应。但他提到的一个概念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展开分析。这个概念就是“跳过”：

“数学特性作为心灵的设想，可以说是跳过(hinwegspringen)诸物而勾勒其物性。”([12], p.92)([13], p.84)“近代科学是在数学勾勒的基础上进行实验的，对事实的实验渴求，是以数学方式预先跳过(überspringen)一切事实的必然结果。”([12], p.93)([13], p.85)

那么，什么是这种“跳过”？什么东西被“跳过”了？为什么在实验中所生产的“事实”，是以“一切事实”已被跳过为前提的？有两种“事实”吗？

四、作为“创生性阻力”的时间

有关现象学是否提出了一种与现代技术科学的概念规定相竞争的直观的问题，将我们引向了海德格尔对后者的批判、以及在这种批判中出现的“跳过事物/事实”的说法。现象学是否是技术科学的竞争者的问题，由此转化为是否有两种“事实”的问题。而无论是康德的框架中对直观和概念规定的二分所蕴含的时间维度，还是海德格尔对“数学特性”的论述中所涉及的“预先”和“已经拥有”，都提示我们：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可以从事物显现或前来照面的时间模式入手。

在这一节中，我将提出一种有关事物展开的内在节律的存在论模型，论证时间的原初意义是事物之堂奥渐次展开的“创生性的阻力”(productive resistance)；与之相比，钟表时间的概念则成了派生性的，是原初时间依照其“数学特性”被同质化后的产物。尽管包括海德格尔在内的现象学思想家曾提出过类似的模型，我此处的论证却不打算依托他们的权威。我们在此关心的是模型本身的严格性、一致性和解释力。在存在论的层面，我的预设是：事物并非在任何时刻都现成地“具有”毫发毕现的一切细节。相反，这些细节或“堂奥”，作为可能的潜在，被“折叠”在事物的“褶子”(fold/pli)里；只有时间才能令这种褶子“展开”(un-fold/dé-ployer)。

这意味着，事物“自身”并非以无时间或超时间的方式存在着、只是在对人这种有限存在者显现时才需要时间；毋宁说，存在本身从不独立于可能的显现，而显现本来就需要时间，与“对谁”显现没有直接关系。事物展开的过程，有其自身的节奏；而人作为一种“对谁”，只是这一过程的见证者。尽管见证对于展开而言是必要的，见证者却不能任意地变更展开的内在节奏。

萨特曾说,如若时间不只是来自于人的有限性的幻觉,而是刻画了一般意义上的存在者的存在方式,那么“即便上帝也要等糖融化。”([14], p.168)没有一种力量,能够凌驾于糖融化的内在节奏之上、一蹴而就实现其本该在时间中展开的诸阶段。类似地,我们也必须等待季节变化,等待庄稼生长,等待恋情发展,等待球赛的结果,等待人生的转折,等待社会事件发酵,乃至等待科学真理的浮现。时间既阻碍着这些阶段“瞬间”实现,又创生性地将它们顺次带出。在这里,等待并非只是一种消极的放任,更不只是“放空”一段长度已知的钟表时间以获得预期的结果(那是实验室中典型的“等待”),而是一种怀着耐心的期备与翘首——用现象学的概念来说,是“接受性中的主动性”(activity in receptivity)。等待,意味着尊重事物内在的时间节律、敬畏它们尚隐藏于未来的神秘:不是因此而疏远或神化它们,而是作为该节律的一部分去见证它的起伏,是承认事物的堂奥永远不可穷尽、永远有其现成显象之外的盈余。

相形之下,现代技术科学的主要特征之一恰恰是在时间性层面的“不尊重”“无耐心”。它的基本倾向是:通过概念的预先规定而跳过等待,直接知晓乃至操纵未来将会发生的事情。作为其基石的因果律,远不只是用于解释已经发生的事件,更重要的是从已经发生的事件出发去预测尚未发生的事件。科学哲学源头处的“休谟问题”之所以重要,也是因为它质疑的是因果规律在过去的维度和未来的维度之间的连续性。休谟提出这个问题,或许是因为感受到“等待”未来之事的必要性;而技术科学在自身的发展中则不假思索地预设这种连续性。

于是,技术科学不愿也不用等待糖的融化:它要做的是精确计算融化所需的钟表时间(以便在这段时间内不用为融化的过程操心)、乃至通过改变外部的条件而不断加速融化。在这种对事物历时展开方式的预先规定之中,技术科学抽取了事物的“数学特性”,将展开的诸环节预先排列在了一条同质的时间线上,如同一个“进度条”。如海德格尔所说,它在这个过

程中获取的从来都是它已经拥有的东西,即一套不关心“进度条”所刻画的事物自身节律的概念框架,而这又以对一切时间节律在钟表时间中的同质化为前提。在钟表时间的层面,对“分”“秒”等计量单位的划分、标定和测算确保了技术科学永远“已经拥有”一套现成的框架,从而能够事先规定未来的基本轮廓;当下未知的,最多是事件在哪一秒发生。但无论它在哪一秒发生,它终归脱不出钟表时间的框架。于是,技术科学得以如同操作当下的现实性一般操作未来(尚未实现)的可能性。一切的时间维度,都以同质化的方式被“当前化”了。

当然,能够被同质化的仅仅是事物的“数学特性”,是其纯形式。而“质料”则代表着形式化所留下的“剩余”(surplus)。它仿佛事物晦暗的内部,尽管能够照亮,却因此而展现出更深更晦暗的内部。这并不涉及对某个永远不可显明的内部的神秘主义设定,而只是事物“需时展开”的存在论特征使然。只要我们尚未站在时间的终点(如果有这么一个终点的话),技术科学就不可能彻底展平事物内部的“褶子”。相反,事物不可穷尽的特征,时时突破技术科学以数学的、概念的方式对它的预先规定。

至此,我们便能够理解海德格尔为何用“跳过”来刻画基于“数学特性”对事物的概念规定。一方面,这种概念规定并非耐心等待事物在时间中的展开,而是意在“超前”(Vorlauf),赶在实际的展开之先便知晓乃至操控展开的具体方式。另一方面,这种超前又不可能穷尽事物的堂奥,不可能消灭事物晦暗的内部;因而,它并非真正提前与事物相遇,而更像是在对事物的可预先规定的形式方面的执迷之中,错过了事物无限的丰富性。

五、结论:现象学作为等待学

我们回到一开始的问题:现象学真的是要提出一种与现代技术科学相竞争的对事物的规定吗?

通过将时间解释为令事物的堂奥逐渐展开的“创生性阻力”,我们现在能够更深刻地地理

解康德在先验感性论和先验分析论之间转换时所说的话:“[概念的]思维无[直观的]内容则空,直观无概念则盲。”([15], p. A51/B75)如果说在时间之内给出的感性直观代表着事物的逐渐显现、展开,而概念思维代表着以时间之外的视角对事物进行预先规定的尝试,那么脱离了前者的后者将是“空”的。近代技术科学如果将事物等同于它对事物的超前的概念规定,^[16]那么它将不能接纳事物前来照面,而不如说是跳过、错过了事物,始终在它遭遇事物之先便已经具有的概念框架中忙碌。对预定的执迷,使得我们在真正意义上等待、尊重和接纳事物的能力日渐枯萎。意义不再处于事物的“褶子”里,而成了处于概念的平面上、有待创造或购买的“通货”。对意义的等待变得“师出无名”。

另一方面,如果缺少通过概念对事物进行的预先规定,那么我们只能“盲目”地追随事物展开的节律,等待全然未知的命运。在这种非科学或前科学的情境下,我们与事物的秘密有着最为直接的接触;这种接触既带来无比丰富的意义,也带来难以逆料的危险。但与此同时,我们将不能够将自己抽离出当下的情境而对该情境进行反思。换言之,我们将只是自然的一部分。由技术科学所代表的“超前”,似乎是人之为人的条件之一。

因此,如果说现象学作为一种严肃考虑人之有限性的哲学立场,其任务之一便是重新为时间、事物的节奏、对这种节奏的翘首等待“正名”,那么它对现代技术科学的反思并非是要提出一种竞争性的规定事物的方式来取代技术科学;它对直观的强调也不是为了取代、而是为了补正技术科学对概念规定的偏重。在存在论层面,现象学不是要提供更多规定,而是要时时提醒我们:事物永远“多于”技术科学借助其“数学特性”对它的预先规定;每一事物,都是一个不可还原为技术科学的知识内容的、值得尊重和等待的他者。一言以蔽之:现象学是对时间所带来的常新的“现”的等待。

- [1] Husserl, E. *Die Krisis der Europäischen Wissenschaften und die Transzendente Phänomenologie: Ein Einleitung in die Phänomenologische Philosophie*[M]. Den Haag: Martinus Nijhoff, 1976, 52.
- [2] Husserl, E. *Ideen zu einer Reinen Phänomenologie und Phänomenologischen Philosophie, Erstes Buch: Allgemeine Einführung in die reine Phänomenologie*[M]. Tübingen: Max Niemeyer, 1913, 53–56.
- [3] Heidegger, M. *Sein und Zeit*[M]. Tübingen: Max Niemeyer, 1967, 92–101.
- [4] Merleau-Ponty, M. *Phénoménologie de la Perception*[M]. Paris: Gallimard, 1945, 289.
- [5] Al-Saji, A. "A Past Which Has Never Been Present": Bergsonian Dimensions in Merleau-Ponty's Theory of the Prepersonal[J]. *Research in Phenomenology*, 2008, 38(1): 41–71.
- [6] Heidegger, M. 'Die Frage nach der Technik'[A], Heidegger, M. (Ed.) *Vorträge und Aufsätze (Gesamtausgabe 7)*[C], 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 2000, 5–36.
- [7] Heidegger, M. *Prolegomena zur Geschichte des Zeitbegriffs (Gesamtausgabe 20)*[M]. 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 1994, 63–99.
- [8] Heidegger, M. *Kant und die Problem der Metaphysik*[M]. 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 1991, 24–25.
- [9] Heidegger, M. *Phänomenologische Interpretation von Kants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Marburger Vorlesung Wintersemester 1927/28 (Gesamtausgabe 25)*[M]. 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 1977, 85–87.
- [10] Lawlor, L. 'Verendlichung (Finitization): The Overcoming of Metaphysics with Life'[J]. *Philosophy Today*, 2004, 48(4): 399–412.
- [11] Heidegger, M. 'Der Ursprung des Kunstwerkes'[A], Heidegger, M. (Ed.) *Holzwege (Gesamtausgabe 5)*[C], 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 1977, 1–74.
- [12] Heidegger, M. *Die Frage nach dem Ding: Zu Kants Lehre von den Transzendentalen Grundsätzen (Gesamtausgabe 41)* [M]. 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 1984, 69.
- [13] 海德格尔. 物的追问: 康德关于先验原理的学说[M]. 赵卫国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0.
- [14] Sartre, J. P. *L'être et le néant*[M]. Paris: Gallimard, 1943.
- [15] Kant, I.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M]. Hamburg: Felix Meiner, 1998.
- [16] 黄裕生. 摆渡在有-无之间的哲学: 第一哲学问题研究[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9, 62.